3版 高郵日報
副刊
2025年6月13日 星期五
乙巳年五月十八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增强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周同

孟城驿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汪曾祺文集》的出版、稿费及其他

□ 陆建华

新中国成立之初,汪曾祺曾一度搁笔改行当编辑,他因此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却也为他新时期复出文坛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新作迭出,呈一发不可收的喜人态势,很快迎来个人创作史上的丰收期,不只有小说散文新作如天女散花般频频出现在国内多家著名文学报刊上,他的新著更是一本接着一本出版,读者争购,十分畅销。但是,其时汪曾祺已是花甲之年,写的又大都是陈年旧事,先要苦思冥想很长时间,再进入艺术构思,然后用手写,他的创作产量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渐渐地,汪曾祺著作重复出版露出迹象了。在不知不觉中,文学界,特别是成千上万的广大读者,逐渐从开始的初看惊艳、喜爱若迷,慢慢变为啧有烦言、微微不满……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将他从步入文坛后至当前的几十年来所有作品汇集起来出一个“文集”。1986年我第一次向汪老提出建议,才说了想法,他就回绝了:“这哪行?出文集是著作等身的作家的事呀!”他虽不答应,但我每次与他见面还是重复提,到了1992年7月,他终于松口了。就在这六年期间,已有吉林、湖北等地出版社向汪老表示为他出文集的意向,但只是说,没有行动,都是因为对文集的出版前景没有把握。我虽然一直记着为汪老出文集的事,但对出文集需要不菲的投资和销售前景不明这两个症结,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吴星飞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系,我与他师出同门,与他谈工作或聊天,少了生疏,平添了亲切感情。我多次向他询问出书的有关情况,还常常似无意却有心地对他说到为汪曾祺出文集的事。既懂文学又精通图书市场行情的吴星飞何等精明,他向我表示,为汪曾祺出文集自然应全力支持,但文集不是一本书,而是总字数超过百万的多本书,有点像押宝,成功了或可赚大钱;押错了,也会血本无归,这对一个全社仅60人左右的省级出版社来说,风险太大!尽管如此,他见我屡提文集事,注意到汪老的写作态势,如林斤澜形容那样不断“行情上涨”;又得知在海内外有深广影响的香港书展定于1993年10月举行,有关部门亦已正式邀请江苏版图书参加——正是这两点促使吴星飞下决心将出版《汪曾祺文集》正式列入1993年出版计划。

1993年9月,四卷五册总字数120万的《汪曾祺文集》正式出版,并作为江苏版图书的重要新书,准时送到香港参展。第一版3000部一个月内售光,以后半年内连续加印两次、每次5000部,都是供不应求。

这都是32年前的往事了,但围绕为汪老出文集一事却留下至今余音不绝的话题。一是原先担心出文集赔本的风险,一变而成无限风光;二是当时的政策规定,稿费800元以上就要交税,《汪曾祺文集》的稿费经七算八扣后,真正拿到的不足2万元。有关心此事的人议论说,如果书稿编定后签定出版合同时,不是“一次付清”,而是“计数稿酬”,那汪老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大稿费了。这是一种常见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卖弄小聪明想法。当时,包括吴星飞社长与我在内的各方,没有一个人想到赚钱,都是一门心思想,能少赔钱把文集正式出版就万幸了。汪老自己在写给我的信中也坦言:“出文集,出版社是要赔钱的,而且不是一个小数,希望出版社再考虑考虑,如何筹措这笔资金。”付印前我与汪老通电话,将吴星飞的想法告诉他:江苏文艺出版社是第一次为作家出文集,参照以往对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汇集成书的稿费标准,定为每千字20元,汪老当即说:“谢谢吴社长费心出版我的文集,一切由你俩商议定,我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当天夜10时,他的老伴施松卿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近年为孙犁出版了文集,每千字是25元,我立即答应,汪老的文集稿费也定这个标准;第二天告诉星飞,他完全赞同。

更稍感欣慰的是,不久又有了一个可喜的弥补机会。1994年秋,我出差苏州,在当地书店发现甘肃文化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一书,打电话到北京汪府表示祝贺,是施松卿老接的电话,意外得知全家正为此烦恼。原来甘肃有关方面出版此书时,事先并没有与汪老联系,出版后也没有按章付给稿费;打电话去查问,有关当事人故意推诿、拖延不处理。我因在中宣部开会时,与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有一面之交,即给他打电话,请他们按章处理。通话后半个月内问题顺利解决,有关方面不但专函向汪老表示歉意,还补发给稿费4万多元。

其实,当时除了出版投资和稿酬这两点,另还有两个难题也十分棘手。一是汪老虽已同意出文集,却表示过两年再说,因为他手头正编着两本书稿。二是按正常出书计划,加上为参加香港书展特别赶编的几本新书,如今又加上《汪曾祺文集》,编辑人手紧张这个实际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吴星飞紧急找我商议,两人苦思冥想半天,只有特急事特办——吴亲自任《汪曾祺文集》的责任编辑,我则立即与汪老的夫人施松卿联系,如实告诉她,江苏已决心为汪老出文集,考虑到汪老已高龄73岁,只请他提供一个四卷五册的文集目录,其他一切事都由我与出版社全权负责。施老一口答应。至于《汪曾祺文集》那总120万字、前后共三次的校对,出版社确实已抽不出人手,这个重任由我承担。

120万字书稿校对任务,其沉甸甸分量我当然知道,但多次冷静分析后,心中是有底的。120万字,乍听吓人,但除极少数篇目(如汪老新写的《文集自序》)外,都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有关报刊得到汪老的手稿后,发表时都是校对过的。现在我发动全家投入书稿的校对,其实是校对复印稿,绝非蛮干。我郑重关照印刷厂,每次排好稿,不分日夜立即送到我的寓所。三校是这样安排的:初校由我的儿女负责,他俩都是南师大新闻系的学生;复校是老伴贾琪,她调省城工作前,长期在高邮当小学语文教师,基本功扎实;我是第三校。让没有参加过稿件校对的全家人负责文集的校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正常办法。不这样做,期盼好几年的为汪老出文集事就只有暂停。最终,《汪曾祺文集》如愿出版,反响强烈,且没有影响我的日常本职工作。

我把文集送到北京汪老手中,他眼含热泪反复抚摩,突然问我:出版社给了你多少劳务费?我只好告诉他:校对费按每万字20元付我,800元后报税;另加700元给我的老伴和孩子。因索要文集的人太多,我送出约50部。出版社优惠我,每部打6折,从我的校对费中扣除。后来人们知道我全家参加校对,提出由我写便条到出版社8折购买,我亲笔给吴星飞写了约20张优惠购书便条……

我的小学

□ 陈其昌

我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踏进1896年创建的城中小学大门的。母校的许多人和事,在我的记忆长河中潺潺流淌了70多年。

学校有一座二层主楼。一楼中间过道,两边各一教室;二楼是两个教室,中间是办公室。登上二楼,隔着窗,可以看运河中白帆来往,舟楫频仍。沿着砖石路,向右一拐,有日机轰炸的遗痕,是一块原图书馆、科技馆留下的水泥地面。在进入主楼前,左边靠墙是丈把高树,迎面是矮小的冬青树。严丝合缝的砖石路两旁是操场,后在西南角又开辟一个较大的操场。学校闹中取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上下课敲打一节铁轨,咚咚,上课了;咚、咚,下课了。我小学毕业时,学校已有千名学生。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叶靓校长,而是他的夫人周慧娟,还有周大炎、沈石如、周玮、陈素青、高承祺、郭恩柱、詹振先、金韵成、夏隆庆、马发其、张锦桂等,他们都教过我的课。

陈素青老师,高个儿,短头发,一双眼睛令人敬畏,仿佛能透视你的心灵。她对德育抓得很紧。

周慧娟老师,一头秀发,明眸皓齿,说话慢言细语,笑容常在。她上课认真,带夜批改作文。后来当副校长,还兼一门算术课,可谓尽心尽力。

金韵成老师,终生为高邮教育事业奋斗,她的学生数以千计,沈阳、西安、广州、重庆、上海等地都有她的学生。我上三年级下学期,家长为我准备了一个有背带的书包,内有文具盒,盒上有苏东坡斜坐的图与“东坡好学”四字。金老师看到文具盒,问:“你知道苏东坡吗?”我说不知,她便将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三杰的故事讲给我听,对我触动很大。

詹振先与滑田友都是美术老师。詹老师带我们到关岳庙内,观看吴道子的大幅观音像。我曾出示指南和尚画的兰竹,他说这是民国时期的作品,类似作品各地皆有。

张锦桂老师弹风琴,教唱歌,她唱一句我们学一句。她说音乐是个好东西,它能超越国界,陶冶性情,涤荡灵魂。学校开会后,常有“余兴”,演出独唱、舞蹈、小演唱、快板、三句半、活报剧等。

薛汉是解放后第一任城中小学校长,旋即被调政府文教科工作,接任者是谢耀华。校长的讲话关键词是毛主席要求少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分析如何学习、如何做人——遵守校规,和睦同学,天天进步。

1949年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几乎是同时,我也加入了少先队。大家选举谈慧同学为学校少先队大队长。每当有活动,她双手拿着铜钹,一敲引路,大鼓小鼓齐鸣,以进行曲的曲调由校内直至运堤。我们曾列队欢迎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代表路过高邮。不住钹鼓声,同一个节奏,“欢迎!欢迎!和平使者!”另一次活动,是老师安排,由谈慧带队,到新生劳改队演出(此处原是城隍庙与圣宫一部分),以歌声、表演感化在押犯人。犯人们都规规矩矩坐着,散场时,我们先走,他们鼓掌欢送。现在我们小学同学都已耄耋之年,看到同学谈慧仍喊“谈大队长”。

1950年6月1日儿童节,城中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在大校场围着篝火,男生、女生手拉手跳集体舞,火焰冉冉上升,跳得真快乐,老师也参与其中。一直玩到篝火熄灭,意犹未尽。

我们就是在这些有爱心、责任心的老师辛勤培育下,无忧无虑地成长。

露天电影

□ 柏杨

露天电影,这种独特的电影放映形式,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到本世纪初逐渐消失。在那个年代,农村社员一年到头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有着干不完的农活,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露天电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难得的消遣方式,能够看上露天电影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儿时的记忆里,晚上能有一场电影可看,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兴奋、惬意。

放露天电影,对环境要求一点也不高,只要有一片宽敞的空地就行,一般都是在学校操场上。接电影的人早早就把挂银幕的杆子挖塘深埋后竖好了,等电影放映员到了之后就先把银幕挂在杆子上,四角扎好,银幕绷紧,再把大喇叭用绳子牵挂到银幕边上,然后去大队干部事先安排好的村民家吃晚饭。

那时候的电影放映员很受欢迎,当知道晚上放电影时,孩子们早就在大队部门口等候去接电影的人回来了。去接电影的一般都是安排两个人,踩着单车,一个车架子后面装着汽油发电机,因为那时农村基本上都没正常供电或者经常停电,另一个车架子后面则装着放映机和电影片盒子,盒子上面写着今晚要放映的电影名字。到大队部的时候,小孩们就围着他们寸步不离,打探有关电影的一切消息,然后好回去作为一种资本宣扬。而这时放映员通常是含糊其词,没熟悉到一定程度,一般不会轻易透露,吊足了等待看电影的孩子胃口。

吃过晚饭,一家几口,每人或拿着椅子,或扛着长板凳,或夹着小矮凳,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电影。远远近近的乡间小路上都是一群群唯恐来迟而匆匆赶路的行人,大家都想早点赶到,可以坐在放映机和银幕中间的位置,生怕去得晚了占不到好位置。那种迫不及待,绝对不是现在玩手机、电脑的人所能想象和体会的。远远的就能看到银幕前面已排满高高低低的板凳,站满一群欢呼雀跃的孩子。天刚擦黑,有些孩子便迫不及待地回家搬来椅子板凳抢位置,为了防止自己的座位被调换或者被外人搬走,孩子们宁可不吃晚饭,也要占好位子。有些活泼好动的男孩,则爬到附近砖垛或草堆上占据最佳制高点。因为看电影的人非常多,所以人群很拥挤,站在后面的人得踮起脚跟朝前看,头颈酸痛不说,眼睛也难受。于是有的人干脆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看到的画面虽然完整,但是全成了左手扔手榴弹或左手拿大砍刀的了,极不习惯。

露天电影一般都要等到天黑之后才放映,因为白天的亮光会影响放映效果。在等待放电影的这段时间里,露天电影场的空地上又成了人们嬉戏打闹的地方。孩子们在四处乱窜,大人们互相问候,聊着家长里短,露天电影场地充满着欢乐喜庆的气氛。在大家翘首以待中,酒足饭饱的电影放映员终于姗姗而来了。先从木箱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放映机架好,然后再慢慢调试好角度。突然,一道灰蓝色的光柱从人们的头顶射向银幕,场地里先是一阵欢呼,然后慢慢静了下来。在调试电影镜头或者断片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孩子站起来用手在镜头光里做各种手影。灯光灭了,嘈杂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一柱柱光束点亮静谧的夜空,在银幕上幻化出各种人物。

那个年代放的电影来来回回就那么几部,即使看过多遍,人们依然乐此不疲,丝毫不觉得单调。那时候的电影以战斗片居多,基本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像什么《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其次就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影片了,如《白毛女》《奴隶的女儿》《决裂》等。那时候人记性特别好,即便首次看一部电影,第二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时,通过你一言我一语就能从头到尾回忆出所有故事情节,模仿出许多经典动作,甚至能背诵大部分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已经成为那个年代许多大人和孩子的口头禅。

现在即便在豪华的影院里,我们也已经很难再找到从前看露天电影时那种单纯、自在、快乐的感觉。儿时那看露天电影的热闹场景,永远只能是最美好的回忆了!

那年冬天

□ 仲元芳

十二三岁那年冬天的记忆,像被泡发的宣纸,褶皱里全是药水的苦涩与高烧的昏沉。那时我总觉得自己像棵被烈日晒蔫的野草,蔫巴巴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断断续续的鞭炮声,才惊觉原来已经到了过年。

最初只是觉得浑身发冷,脑袋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晕晕乎乎的。妈妈着急地领我去了卫生院,医生简单问了几句,就当成感冒开了药。那灰不拉叽的羚羊感冒片,每次塞进嘴里都苦得我直皱眉头,可即便一次吃好几片,一天三次,病情也丝毫没有好转。接着就是吊水,各种各样的液体顺着输液管流进血管,每天都要在卫生院坐上大半天。尤其是那丁卡霉素,一打就是一两个月,连小便都带着刺鼻的药味,而且贵得要命。

每天都在发烧中煎熬,体温常常烧到三十九度多。好不容易在卫生院吊完水退了烧,可一回到家,热度又像潮水般涌来。更难熬的是饮食,妈妈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说法,坚决不让我吃一粒米饭,每天的饭菜只有青菜汤和馒头。过年本是难得解馋的日子,我却只能独自待在小房间里,闻着从厨房飘来的香喷喷的饭菜味道,肚子饿得咕咕叫,口水直往肚里咽。

高热持续了十多天,整个人被折磨得没了精气神。直到一个上过卫校的正规医生出现,建议我到运河对面的车逻卫生院化验血,这才确诊为副伤寒。防保人员很快上门登记、消毒,还给了我消毒液体,让我自己消毒碗筷。那时正值寒假,别的孩子都在欢天喜地地过年、玩耍,我却只能被困在这病痛之中。

看着妈妈整日愁眉不展的样子,我知道她也在为我的病情着急,只是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年冬天的经历,成了我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它让我深刻体会到健康的珍贵,也让我坚定了从医的决心,希望以后能帮助更多像曾经的我一样,在病痛中苦苦挣扎的人。